

艾青精选集

世纪文学·60家

shiji
wenxue
60jia

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品·



shiji
wenxue
60jia

世纪文学 60 家

艾青 著

艾青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青精选集 / 艾青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2012.2重印)

ISBN 978-7-5402-0841-7

I. 艾… II. 艾…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8044 号

艾青精选集

作 者 艾 青

责任编辑 张红梅 许 诺

封面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42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 2 月第 4 版 2012 年 2 月第 5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总策划：

白烨、陈骏涛、倪培耕、贺绍俊、张红梅

“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专家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 丁 帆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中忱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富仁 汕头大学中文系教授
白 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 郁 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吴思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骏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孟繁华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於可训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匡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 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 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 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中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 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洪子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贺绍俊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谢 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雷 达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
黎湘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出版前言

20 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 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上承 19 世纪,下启 21 世纪的 20 世纪华文文学,在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连接和与时代情绪的遥相呼应中,积极地开拓进取和不断地自我革新,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焕发出青春活力的精神写照,更是一笔浓墨重彩、彪炳史册的文化财富。20 世纪的华文文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构成,成为后世所传承,20 世纪的那些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必将作为经典为后人所记取。

抱着共同的目的和相同的旨趣,以“世界文学文库”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的北京燕山出版社,得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陈骏涛、贺绍俊总策划,开始了这项以“世纪文学 60 家”命名的策划、评选活动。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创编与推出,旨在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 20 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进一步促进先进文化的积累与经典作品的传播,满足新一代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为使“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评选、出版活动,既体现文学专家的学术见识,又吸纳文学读者的有益意见,我们采取了专家评选与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秉承客观、公平、公开的原则,力图综合各个方面的意愿与要求,反映 20

世纪华文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文学研究专家的普遍共识和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作品的阅读取向。

基于上述评选宗旨和评选原则,经专家推荐,我们依据 20 世纪华文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经过反复推敲和斟酌,确定了 100 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其后,又约请 25 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组成“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委员会,在 100 位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书面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为顺序,产生了“世纪文学 60 家”的专家评选结果。为了吸纳广大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作家及作品的相关看法和阅读意向,我们得到了在国内最具人气的“新浪网·读书频道”的鼎力支持,与其全力合作,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华文‘世纪文学 60 家’全民网络大评选”活动。2005 年 12 月 16 日,读者评选结果在“新浪网·读书频道”正式公布。

为了使“世纪文学 60 家”的评选与编选,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专家和读者两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最终以各占 50% 的权重,得出了“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入选名单。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之外,我们还约请有关专家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其意都在于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及其创作上的特点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 20 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此书系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 60 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

我生活着 故我歌唱

刘金冬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一 “我写作，写作，第三个还是写作……”

艾青(1910—1996)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畷田蒋村的一个地主家里。原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曾经用过的笔名有：莪伽、克阿、纳雍、林壁。在1933年5月1日出版的《现代》第三卷第一期上，艾青发表了为后来的评论家所多次引用的具有现代主义诗风的诗歌《芦笛》，这是报刊第一次出现艾青这一笔名。从1934年《大堰河——我的保姆》引起轰动以后，艾青基本上就使用这一笔名了。

艾青一生最重要的经历在他人生一开始时就发生了。因为艾青是出生时难产，算命先生就说他克父母，一到四岁他都被寄养在贫苦农民大堰河(大叶荷的谐音)的家里，一直到五岁才回到自己家里读书，但也只能叫父母为叔叔、婶婶。这是一个生活上有父母、精神上无父母的孩子。缺少亲情的少年艾青不知不

觉对大自然和民间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整日画画，学习金石，还在篆刻上下过工夫。1925年他考上了金华省立第七中学，“中学老师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自修室随笔》，我写了一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反对念文言文。”^①省立七中沉闷的学习空气，使艾青终生对学院派教育持反感态度。但是，中学生活还是有两件值得纪念的事：一是遇见了在国画和篆刻上都有很高造诣的恩师张书旗，使他决定学习绘画；一是得到了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②1928年，艾青考入国立西湖艺术院，开始沉迷于屠格涅夫的小说《猎人笔记》和《父与子》等，他由此出发，渐渐地体悟到了一种宽泛的人类之爱的精神。

1929年春，艾青自费去法国学画，巴黎的三年是“精神上自由，生活上贫穷”的三年。诗人上午干活，下午学画，贫穷使他过着一种半流浪式的生活，但自由使他认识了终生影响诗人创作的现代主义诗人阿波里内尔、凡尔哈仑和兰波，还有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作为一个弱国子民，他深切地体会到了无处不在的悲哀和耻辱，就是在这里，诗人的爱国主义意识萌生了。他参加了“世界反帝大同盟”东方部成立大会，并写下了他的处女作《会合》^③，这首诗奠定了诗人一生创作的主旋律：为时代、为民族、为受压迫的人们而歌唱。

1932年春，诗人回国，不久即参加了“左联”美术家协会，并

① 《艾青全集》第3卷。

② 《艾青全集》第3卷。

③ 有人考证艾青的处女作是写于1928年的《游痕》（二首），本文因艾青本人的否定性评价而不取此说。

与江丰、力扬等画家组成“春地画会”，发行美术画报并举办画展。这些活动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他被捕入狱并以危害民国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在狱中，因缺少绘画必需的颜料和模特等，艾青不得已转入诗歌创作，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就写于狱中。据统计，诗人狱中作诗共26首，同时还翻译了凡尔哈仑的诗集《原野与城市》。出狱后，开始在常州、上海和杭州之间为生计而奔波。这一段时间最可纪念的事是1936年诗集《大堰河》的出版，因为对“成为一个人类最伟大的歌手”的强烈渴望与意识到的现实不可能性之间的尖锐冲突，曾引起过诗人深刻的精神危机。诗集的出版引起胡风和茅盾的注意，胡风因此称他为“吹芦笛的诗人”。而第一个评论者则是茅盾，他说：“……《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是一首长诗，用沉郁的笔调细写了乳娘兼女佣（大堰河）的生活痛苦，这在体制上使我联想到《学徒苦》。可是两诗比较，我不能不喜欢《大堰河》。”^①艾青一出场就受到两位现实主义评论大师的注意，不能不说是历史机缘的偶合，同时也为他奠定了新诗史上的地位。

抗战的爆发，在艾青看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因为它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转折点。就在卢沟桥事变的前一日，艾青在沪杭路上写下了《复活的土地》一诗，他预言：“因为，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此时的艾青在杭州蕙兰中学教书，面对全国普遍抗战的大形势，他不得不思考将来怎么办的问题。他既希望参加抗战，更渴望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从容地写作。在杭州的最后一首诗是《他起来了》，“因为他必须如此/因为他/必须从敌人的死亡/夺回来自己的生存”。这里

^① 茅盾：《论初期白话诗》，《文学》第8卷第1期，1937年1月1日。

有诗人说服自己离开杭州的意思，也有把祖国化为一个人的形象进行抗战的象征意味。

在整个抗战期间，艾青一直在两种情绪中徘徊，一方面，面对抗战，他自觉地为民族、为时代而歌唱；另一方面，面对自己的内心，他常常陷入寂寞、孤独和茫然的状态之中。所以，他除了大量为时代而歌的作品外，也有很多寄寓个人情怀的写景诗和无题诗。尤其是退居湖南衡山和新宁两个时期的诗作，更多地流露了诗人丰富、复杂的个人精神世界。

1937年冬天，诗人来到武汉，写出了表现时代苦难的传世之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1938年初，诗人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教书，不久，转回西安，在“抗日艺术队”当队长。这一段时间，他辗转于陇海路沿线，经过潼关、临潼、风陵渡等战争前线，亲眼看到了炮火下中国劳动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惨景，改变了战争初期一度昂扬奋发的调子：《北方诗草》、《手推车》、《北方》又开始延续抗战前忧郁、悲哀的情绪。但此时的忧郁来自于诗人忧国忧民的灵魂，反映的是一种民族的悲哀；而抗战前的忧郁更多地是来自诗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气质，反映的是时代浪子自我感伤的情怀。当诗人再次回到武汉时，很快完成了长诗《向太阳》的写作。武汉沦陷后，艾青去湖南衡山省立乡师任教。山居野趣再次唤起了他对安定生活的向往之心，《秋日游》、《斜坡》、《秋晨》等诗都是诗人对大自然欣赏、赞颂的风景诗。

正是为了要过一份安定的生活，艾青于1938年11月去了桂林，在《广西日报》主编副刊《南方》。在此期间，他的创作又有了新的收获，就是长诗《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在诗中，诗人把自己当作吹号的士兵，当作慷慨赴死的战士，也因此

引起了一些争论。另外，他还创作了《冬日的林子》、《我爱这土地》、《死难者画像》、《街》和《我们的田地》等。这一时期，诗人因为看到了两年的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陷入困惑和思考当中。表现在诗作中就是描写自然风物和怀乡忆旧的诗多了起来，《黄昏》、《怀临汾》、《出发》、《骆驼》、《秋晨》等，这些诗都没有表现时代与战争的重大主题，而是更多地抒写个人心境。这种诗歌创作恰好与当时他和戴望舒主编的诗刊《顶点》的诗歌观相吻合。1940年初，诗人因为个人生活的变故，来到湖南新宁衡山师范学校任教。安静的乡居生活使诗人真正回到了个人的内心世界，他在教书、绘画之余，写下了大量的咏物诗和静物诗，如《水牛》、《独木桥》、《刘草的孩子》、《冬天的池沼》、《牝牛》、《灌木林》、《水鸟》、《旷野》、《解冻》等；诗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思考着人生的荒谬与局限，达到了诗人诗思最高的探询深度。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并没有忘却时代，还写了一些为后人所诟病的“急就章”，如《马雅可夫斯基》、《通缉令》、《仇恨的歌》等。当然，诗人的优秀长诗《火把》也写于此时。

1940年6月，诗人来到重庆北碚育才学校教书，写了一些田园诗，如《高粱》、《老人》、《荒凉》等，同时构思和写作反法西斯的长诗《溃灭》片断。“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追捕进步文化人士，周恩来负责临时疏散工作，在他的帮助下，1941年3月，诗人来到了红都延安。这是一个新天新地，在这里，诗人重新思考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他的创作思想和风格也开始发生变化。诗作《强盗和诗人》、《时代》、《群众》、《我的父亲》就是诗风转变前夜的诗作，尤其是《我的父亲》，诗人把父亲写成一个地主阶级的典型，可能是开了风气之先。1943年，诗人尝试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写诗，长诗《雪里钻》、《吴满有》都失败了，但

《少年行》、《献给乡村的诗》、《野火》仍是艺术上的成功之作。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诗人因为经常出访的缘故，写了大量“国际题材”的作品。其中，《礁石》、《珠贝》都是在写实中寄寓象征意味的诗作，表现了诗人艺术追求上的复杂性。1957年后，诗人因“右派”问题，先后被送往北大荒和新疆石河子劳动改造，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1978年4月30日，《文汇报》发表署名艾青的短诗《红旗》，这是诗人复出的标志。在以后五年多的时间里，诗人共发表诗作200余首，其中长诗《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扬》等，在当时反响强烈。还有一些哲理诗，如《镜子》、《鱼化石》、《关于眼睛》、《盆景》、《互相被发现》、《山核桃》等，因为寄托明显，诗意显得转为淡薄。不过，有些对音乐、舞蹈、体育瞬间感悟的诗流露了诗人“发现的惊异”。

艾青是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也是一个终生写作的人。他说：“我写作，写作，第三个还是写作——人生在我的活动里显得多么简单。假如有一天，我对自己的写作生活起了怀疑，那一天当是我的末日。”^①对于艾青来说，写作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因此，他宣布：“我生活着，故我歌唱。”也因此，生活的全部内容都可以来到诗人的笔下，万物百态也可以各有其美。蓝棣之据此称艾青为“行吟诗人”。

二 “……我长久地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

诗人一生的创作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从1932年至1949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第二段从1950年至1978年，是沉寂期；

^① 《艾青全集》第3卷。

第三段从1979年至1984年,是复出期。而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诗人强烈的爱:爱祖国、爱土地、爱人民、爱大地上一切的生命。诗人在《诗人论》中说:“为什么你们永远不安?一种比什么都更强烈的爱情,在你们的胸中汹涌。”

诗人是以《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引起诗坛注目的,他要把这支歌“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呈给爱我如爱我儿子般的大堰河。”诗人的成名作在起点上就与我们民族多灾多难的土地和勤劳质朴的人民取得了血肉般的联系。诗人曾说,这首诗与《我的父亲》是姊妹篇,都是关于亲人的回忆。在这首诗中,诗人是一个地主阶级叛逆的儿子,他的真正母亲是中国大地上一切善良而不幸的劳动者。大堰河不仅是诗人的乳母,因为“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而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她是土地的化身,是中国农民的化身。这首诗预示了诗人以后创作的两个方向性特点:普通农民的命运是诗人永远的关注中心;土地是诗人最重要也最具感情的意象。诗人曾说:这个无限广阔的国家的无限丰富的农村生活——无论旧的还是新的——都要求在新诗上有它的重要篇幅。艾青最真切的诗都是献给农村与农民的。有农民受蹂躏的痛苦:“‘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里最能体现艾青作为大诗人的才气、胸怀、境界和想象力。他把失去家园的、流亡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活’的雕塑。在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诗歌里,谁能够这样用一个具体、准确的形象整体想象中国的苦难?”^①艾青以诗向全世界宣说苦难、表达信心。“在北方/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

^① 王光明:《苦难中国的想象与现代诗的境界》,《扬子江》2004年第4期。

着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乞丐》)。这是战争中农民的苦难、饥饿的活画像。在《农夫》中,诗人把农民与土地作比,说农民是从土地里钻出来的:“脸是土地的颜色/身上发出土地的气息/手像木桩一样粗拙”“你们阴郁如土地/不说话也像土地/你们的愚蠢,固执与不驯服/更像土地呵”。早在1940年,冯雪峰就以孟辛为笔名评论说:“艾青……在根本上就正和中国现代大众的精神结合着的,本质上的诗人。……他的诗就和农民大众结着精神上的联系。……他的本质和力量却建筑在农村青年式的真挚,深沉,和爱的固执上,艾青的根是深深地植在土地上。”^①当农民翻身得到土地的时候,艾青唱道:“云从东方来/天下雨了”“到处都淋着雨水/到处都好像在笑”(《播谷鸟集》)。诗人写着农民,写着土地,并通过对农民与土地的抒写而写出中国农村变化的灵魂。

艾青深爱着农民,深爱着土地,因此也深爱着祖国。“土地”的意象里凝结了诗人对祖国最深沉、最诚挚的爱。“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这歌声发自诗人的心灵深处,也发自我们民族生命的深处,因此而具有了永恒的艺术魅力。在诗中,诗人把自己比作一只鸟,要歌唱,一直歌唱到死。为谁歌唱?诗人一连用了四个象征性诗句来概括“鸟”所肩负的神圣使命。鸟要表达被侵略的土地的屈辱感;要传达民众的反抗情绪;还要讴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完成这些使命以后,“鸟”死了,但它死也不愿意离开

^① 孟辛:《论两个诗人及诗的精神和形式》,《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块土地——“死了”以后连“羽毛”也要“腐烂在土地里面”。这是一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但这是生我养我的祖国！这种诚挚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中国现代社会具有极大的典型性与普遍性。

与农民的苦难和土地的忧伤直接相关的是诗人对理想的热烈情怀，这是诗人灵魂的另一面：对光明、春天、黎明、生命与火焰的不倦歌唱。在诗中表现为对“太阳”意象的反复抒写：如《太阳》、《春》、《生命》、《黎明》、《向太阳》、《愿春天早点来》、《火把》、《给太阳》、《太阳的话》、《黎明的通知》、《野火》、《春姑娘》、《启明星》、《东方是怎样红起来的》和《光的赞歌》等诗作。艾青知道光明的到来是要付出血的牺牲的，他的《春》是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诗的最后两句是“人问：春从何处来？/我说：来自郊外的墓窟。”把百花盛开的春天与黑暗的墓穴相连，启发读者想到，是烈士的斑斑血迹在黑夜里“爆开了无数的蓓蕾/点缀得江南处处是春了”。写于抗战前夜的《太阳》也有类似的句子：“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有论者写道：“……在表现光明来临的路上，竟放上黑暗的意象、苦难的意象以及献身死亡的意象”，而郭沫若的《太阳礼赞》“绝无黑暗、死亡之意象的联想”。^①这种对光与暗互相交织的认识不仅来源于诗人看待事物的眼光，更与诗人的诗歌观念有关。诗人从“彩色的欧罗巴”带来的“芦笛”是波特莱尔象征主义的交感互动意识，是对万事万物互相联系互有感应的理解，诗人宣布：“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芦笛》）这“芦笛”吹出的是诗

^① 骆寒超：《论艾青诗的抒情结构》，《浙江学刊》1981年第2期。

人的独立意志和自觉的自我意识。因此,诗人的创作既有别于当时一味革命的诗人的呐喊,又不同于一味地强调内心的现代派,显示了一种对大众诗歌与纯诗派诗歌的某种融合倾向,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标志着中国新诗第三次整合的完成。^①

在“太阳意象”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向太阳》、《火把》和《黎明的通知》等几首诗。《向太阳》是诗人承前启后式的作品,诗中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诗人一贯忧郁的情怀,可以说是诗人对如何为抗战抒情的一个新的探索性作品。《火把》是艾青最具影响力的一首叙事性长诗。诗人在1940年写的《为了胜利——三年来创作的一个报告》中说:“今年5月初,我写了《火把》,这可说是《向太阳》的姊妹篇。这是我有意识地采用口语的尝试,企图使自己对大众化问题给以实践的解释。”“火把”是一个具有极大象征意义的意象,“‘火把’是艾青这一代人精神生活的大背景,对他与他同代人来说,如果过一种没有火把照耀的生活,几乎不可想象。”^②诗中,诗人第一次创造了有名有姓有性格的人物:唐尼和李茵,并写了唐尼在火把之夜的转变——从个人的失恋中清醒过来,重新点亮火把,加入队伍,最后把火把带回家,看着五年前为革命牺牲的哥哥的遗像,她给自己的心愿是“会好起来的”,“会坚强起来的”。而李茵经过了短暂而失败的婚姻之后,已经知道,世界上有比家庭更深厚的感情,这就是“同志爱”。全诗基本上由对话和情景描写组成,这里的对话和情景都有弦外之音,切入了人物与时代的深处。这首诗在国统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青年因为阅读《火把》而走向革命。朱自

①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 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清在《抗战与诗》一文中说：“这篇诗描写火把游行，正是大众力量的表现，而以恋爱的故事结尾，在结构上也许匀称些。可是指示私生活的公众化一个倾向，而不至于公式化，却是值得特别注意的。”^①艾青自己对这首诗的主题也阐述过，他说：“一种东西……一种完全新的东西是什么呢？……群众的行动所发挥出来的集体的力量，群众本身所赋有的民主的精神，群众的不可抵御的革命精神。《火把》这个千行长诗，歌颂的就是这种正在无限止地扩张着的‘力量’和‘精神’。”^②《黎明的通知》则宣告了新的时代的来临：“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诗人预言：中华民族的黎明就要来了。诗人以黎明的口气道出了人们的祈盼。这首诗写于1942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大片领土沦入日本的铁蹄之下，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了封锁与绞杀的政策，诗人对抗战胜利前景的预期完全出于一个诗人的敏感和一个中国人的自尊。

当然，艾青所写的意象是丰富多彩的，不是仅限于土地与太阳，但对土地与太阳的抒写使他的诗获得了一种独特性，也因此与古典诗歌的意象区别开来，创立了属于艾青个人特质的意象群。

艾青的诗风有一种“忧郁美”，是一种浸透血液、浸透骨髓的忧郁。这忧郁一方面来自与生俱来的气质，并感染了农民的忧郁品质；另一方面也是时代苦难的具体表现。诗人说：“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③诗人

① 朱自清：《抗战与诗》，见《新诗杂话》，北京三联书店。

② 艾青：《关于〈火把〉——答壁岩先生的批评》，《艾青全集》第3卷。

③ 艾青：《诗论》，《艾青全集》第3卷。